揭秘诺奖得主理查德·塞勒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

■ 邹新月 陈玉琳

▶▶▶ [上接02版]

(三)政府政策行为应用

塞勒借用弗里德曼(M.Friedman)用过的一个词,“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来研究储蓄、社会福利、信用市场、环保政策、医疗保险,婚姻制度等议题,促进了大众对选择设计和助推的了解,进而在其他领域激发出更多改善人类生活的创意。助推思想主张不采用强制手段,而是改变相应的经济动机与行为使之更加优化。

1.*社会福利政策*。根据卡罗尔(Carroll)在民营化社会安全制度上的研究,以民众选择权至上的瑞典模式主张提供尽可能多的选项,然后让民众自行决定,而且可以看到政策的设计者几乎在每个阶段都采取自由放任。塞勒(R.Thaler,2008)提醒我们,当给民众选择愈多,便应该提供更多的资源协助人们做出选择。但是,美国联邦医疗保险设计处方药计划(the Federal 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Plans)则是一个反例。该项计划也是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热门话题,当时副总统戈尔(Gore)提出一项典型的政府指令,将处方药保险以单一计划纳入联邦医疗保险,然后将此方案提供给所有老人;而当时共和党布什则是提供许多种药物计划,消费者可以选择是否要加入以及加入哪一种计划。事实上,虽然大家都认为处方药保险能符合计划者最初预期,但从选择设计角度上说,若因为对美国老人太有信心而将选择权完全交给他们,将更不利于他们去做出明智的决策。提供多种选择通常是好的,但若涉及复杂问题,高明的选择设计却能引导人们做出更多明智的决定。设计者要创造对使用者有利的设计,除了要了解一般人需要何种服务以外,还要注意简单至上。

2.*器官移植政策*。2006年1月美国有将近9万多患者在等待着器官的移植。许多患者在等待中死亡,并且在等待中死亡的人数每年还以12%的速度增长。于是塞勒(R.Thaler,2008)将这个议题提出,他相信通过简单的措施就可以拯救成千上万条性命,所用的方法就是运用选择设计来提高捐赠率,而提高捐赠率所面对的主要障碍就是获得家属的同意。原先在美国多数州中,采取的是明确同意原则,即是指民众必须采取登记等具体的行动来表明愿意捐赠,但是作为一般人群中的个体,惰性给每个人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觑,如果可以预设规则那将会带来不一样的结果。于是塞勒(R.Thaler,2008)提出认定同意制,既保留了选择的自由,但又与明确同意制不同;根据这项规定,所有民众都被认定为同意捐赠,但还是可以登记不愿意,并且登记的方式特别容易。这里又要提及之前所说的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其主要精神就是让人在实现自由意志时只需付出极低的代价,最好是不付出任何代价。在Johnson & Goldstein(2006)的实验中即可以得出答案,预设规定的设计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当民众必须同意才捐赠时,只有42%的人会做,但是如果必须同意才能不捐赠时,则有82%的人同意捐赠,即便是中立模式,也有79%的人同意。虽然认定同意制好,但是塞勒提出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基本架构,才可以成功地将死亡捐献者的器官移植给需要的人。2006年伊利诺伊州通过第一个同意登记法,此法规吸引了230多万人登记器官捐赠,其核心特色就是,即使家属不同意,只要本人表示同意即可捐赠,其中设计简明的登记网址就是最高明的助推力。政府强调问题的重要性,内容直接诉诸社会影响力,网页连接到Myspace可以直接彰显爱心,由此可以看出,好的预设规则可以带来很好的结果,实验的结果对于以后美国政策的制定会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

3.*储蓄投资政策*。塞勒对于储蓄投资问题一直给予高度关注。塞勒与其同事谢弗林就这一问题撰写了一篇题名为《自我控制的经济理论》(Shefrin & Thaler,1981)的论文,论文讨论了有关人类优化选择的事例——“圣诞俱乐部”账户,该账户每个月能够从银行客户的账户中扣除预设的金额,以存下来作为他们的年终购物资金。用行为主义的术语来讲,这种做法叫作“捆绑”,因为它将一整年众多有关花费或保存的决定合并成一个年初的单一决定。美国401(k)计划就是像圣诞俱乐部模式一样的一个混合体,这是一个存款工具,它每次从薪水中自动扣除。是否为退休保存足够的钱,这样一个大而简单的决定被分成了一系列复杂的选择:你是否愿意参加401(k)计划?你想留出收入的多少参与?这37种不同的共同基金中你想选择哪种方式将钱存进去?对于数百万的美国人而言,他们的回答是:我不想思索这些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塞勒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什洛莫偶然发现了一种方法来对付这种冲动,随后他们合作发表了《储蓄计划贡献的多元化定义》(Shlomo & Thaler,2001)、《退休储蓄行为的直观推断和偏见》(Shlomo & Thaler,2007)、《行为经济学与退休储蓄危机》(Shlomo & Thaler,2013)等论文,论文中写到许多国家正面临退休储蓄的危机,例如,在美国传统养老金福利减少,个人储蓄率低下,很大一部分人冒着未来资金不足的风险,用透支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惯有的生活方式。而参与养老金计划的员工数量不足,加上经济危机复苏缓慢等一系列的因素,将导致美国史上可能出现的最大退休危机。很显然,大多数家庭都需要增加退休金储蓄,但尽管如此,由于数目缺额过大,人们只能延长工作时间,否则就会面临退休后生活质量下降的可能性。幸运的是,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除了合理的财政政策,我们可以利用行为经济学研究的结果去改变退休计划的架构,并且鼓励所有人参加一系列的退休计划。塞勒和什洛莫(2001)认为,实行以工资为基础的储蓄计划是中产阶级最有效的储蓄方式,但是实行计划的关键在于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其中。对于任何一个要使退休储蓄金变得充足的综合性计划来说,有四个至关重要的基本部分:通用性、自动登记、自动投资和自动升级。通用性是指每个人应该可以很容易地进入这项计划,通过自动登记系统使人们更方便地进入这些计划和克服阻碍签约的拖延。塞勒所发表的《为明天储蓄更多:用行为经济学来提高雇员储蓄》(2004)一文,基于行为金融的研究,设计了一个“为明天储蓄更多”(Save More Tomorrow,SMT)的方案,它要求美国401(k)计划的参与者在每次加薪后同意自动提升他们的贡献率,把储蓄率和薪酬增长挂钩,要求员工从现在到今后提高他们的储蓄金,并且利用惯性使人们留在这项计划中。在使用SMT的第一家公司中,参加过这项计划的员工最终储蓄率从3.5%增长到13.6%,几乎4倍的增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里·马科维茨自己所在的一家公司也为401(k)参与者提供过指导,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夏普则用此项方案成立了另一家公司,这些事实足以证明此项计划的成功。与此同时,塞勒在2009年9月15日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说道:“我认为在21世纪的后几十年中,美国从中国经济增长上获利颇多,美国的储蓄率几乎是零。现在危机发生后,我们需要更多资金来刺激经济,储蓄率也暂时上升。”奥巴马总统认识到,美国需要更多资金来刺激经济,但也需要注意赤字问题,他最近也宣布了一个计划,以更好地帮助美国人储蓄,改进现在的退休金储蓄政策,为普通美国人参与养老储蓄提供更多机会。这是使用了行为经济学中助推思想——推动更多的人参与,并为明天的生活储蓄。

这种储蓄的例子也可以应用在其他领域,例如医疗保健开支的巨大增长不仅仅是医疗体制的问题,也是我们没有更好地鼓励人们去追求健康的生活。如果我们能够引导人们进行一种健康饮食和多运动的生活方式,我们最终交付治疗的花费会更少,政府适当地利用行为金融的角度去引导人们的日常行为,比仅仅在财政上刺激会更加有效。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对政策进行优化设计,引导人们在教育、投资、卫生、保健、抵押贷款和环境保护等领域做出更加健康、富有、快乐的选择。

三、简评

塞勒被认为是现代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领域的重要先驱者。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行为经济学家卡内曼甚至将自己的获奖归功于塞勒,称他是“首位将心理学引入经济学,开创了行为经济学”的学者。当然,塞勒可能也是最有争议的经济学家之一,争议的焦点源于他倾向于强调事实与权威传统经济学理论的不一致。其实,塞勒所提倡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历史久远,比如,马歇尔和凯恩斯等经济学家就经常从人们的日常行为角度对当时的经济理论进行反思。二战后经济学家们强调数学结果和理想化假设下的研究结论,但其实许多经济现象和事实却不是这样,塞勒从心理学角度呼吁经济学家们从理想化假设中解脱出来,因此可以说塞勒是延续了一种因数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而被打断的、始于亚当·斯密的传统经济学。

塞勒研究了很多反常现象,不过他自己也承认,其研究目的不是颠覆传统经济理论,而是希望学者们对反常事物有一个认知并以此推动传统经济理论的不断完善。塞勒对反常现象的思考也引发了人们对经济理论的思考,即当现有经济学理论不能很好地指导我们决策的时候,唯一的途径似乎正是按照塞勒所追求的,关注人的行为,不断质疑、不断思考。弥补现有经济学理论的缺陷。此外,塞勒的研究成果之所以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还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学术研究紧紧围绕行为经济学前沿理论,更重要的是因为塞勒循循善诱的行文特色及通俗易懂的魅力语言,感染了经济学界的学者们去探究人类至今未知的知识领域。 **(完)**

(此文原题为《理查德·塞勒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2015年度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会长学术贡献评介》,载《经济学动态》2015年第1期)

经济学是最有希望冲击世界一流的一个学科

■ 田国强

▶▶▶ [上接9月29日03版]

“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是指创造一些条件或环境,使得高水平人才愿意来、愿意留下来并成长为卓越人才。只有高水平的领军人物,才能够引进高水平的人,引得进人,引得进好的、高水平的人。除此之外,尽管有高层次团队的引领,用人单位还须承诺给引进来的人才提供诸如下面的条件: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住房补贴和科研经费支持;独立的办公空间等硬件支持;有利于“优胜劣汰”的人事管理制度(如Tenure Track,即常任轨制度);提供同国际标准接轨的评价和考核体系以及基于绩效的奖惩制度和“留得住”的Counter Offer(还盘、还价)制度。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强调“流得动”?因为要真正实现“引得进”“批量跟进”“留得住”,还需“流得动”,它也是Tenure Track制度的核心。资金是有限的,即使资金充足,但教师、科研岗位也是有限的,从而每个单位、每个学校的教师或研究人员的名额和编制都是有限的。如果不能形成动态平衡,原有的再加上引进的人无论好坏,所有人都沉淀下来,结果就是无法引进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更无法激励教师做世界一流的研究。因此,只有“流得动”作为前提,才能更好更多地“引得进”,不断优化师资,补充人才的流失和人员的淘汰。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是国内唯一严格执行六年“非升即走”的经济管理院系。当然,经济学院的改革不仅仅是引进一些海归那么简单,其改革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高起点的经济学教育科研改革系统工程,通过以下六个方面的举措形成了具有内在逻辑的改革、发展、稳定、创新的良性互动推进关系,从而确保了队伍的活力和质量:一是创新人才开发机制,打造一流师资队伍;二是创新人才管理机制,实行双轨人事管理;三是创新科研体制机制,强化高端学术研究;四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五是狠抓教风学风建设,强化论文质量管理;六是创新行政管理体制,提高行政服务效能。

(四)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学术环境

当然,人才不仅要靠引进,还要靠培养。经济学人才的培养,最重要的不是仪器设备,而是一个国际化的、能够滋养学术成长的研究环境。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的经济学系之所以成为世界一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国际化、高频次、多层次、定期化的学术交流活动。这些经济学系一般只是由一些组织比较松散的“领域”(field)组成,如微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产业组织与拍卖、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卫生经济学、公共财政和国际贸易等。通常每一个领域每周有一次研讨会(Workshop或Seminar),形成系列化的学术研讨交流体系,请校内外的教授讲论文。上海财经大学理论经济学科之所以能吸引大批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加盟经济学院,具有这样的国际化学术交流活动是一个很重要的必要条件,在过去的10年中,就举行了700多场每周定期召开的Seminar研讨会。

上海财经大学的经济学科建设之所以取得了令国内外瞩目的卓越成效,就是较好地解决了前面提及的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列出的三大问题。自2004年以来,依托国内首创、首批“国家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经济学创新平台”,经济学院作为改革的试验田,围绕“打造一流师资、加强学术研究、深化教学改革、狠抓学风教风、强化教师考核、规范行政管理”等六大核心工作,全面实施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体制内经济学教育科研改革系统工程,求真务实,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绩。

三、中国可以为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做出哪些新贡献

当今世界的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国家之间的竞争说穿了就是资源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制度的竞争和话语权的竞争,包括学术话语权。中国经济由于持续快速发展及与全球经济的深度融合,已经在经济话语权的竞争中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是在经济学的学术话语权竞争方面还比较落后,亟待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并且,随着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新时期,如果没有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为学理支撑,中国不可能正确处理好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

(一)科学经济分析的三个维度

现代经济学主要以个体(无论是国家层面、企业层面、单位或个人层面)通常逐利为基本出发点,通过引入与采用严谨的科学方法并运用数学分析工具——先对现实进行历史和实证的观察,通过严谨的内在逻辑分析上升到理论,然后再回到现实中去进行观察和检验——来系统地探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现象。这种系统探究,既涉及经济理论的形式,也为经济数据的考察提供了分析工具。由于研究社会经济问题不能轻易拿现实社会做实验,否则代价太大,因而既需要有内在逻辑推断的理论分析,同时也需要有历史的大视野、大视角来进行纵向与横向比较分析,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而且还需要运用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等工具手段进行实证量化分析或检验。总之,理论、历史和统计的三维度分析缺一不可。按照笔者的理解和解读,这就是为什么熊彼特认为一个经济“科学”家与一般经济学家的差别在于进行经济分析时是否采用了三要素:第一,理论,要有内在逻辑分析;第二,历史,要有历史视野的分析;第三,统计,要有数据,有实证的分析。

(二)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两个分类

同时,现代经济学理论可划分为两类,且这两类理论都异常重要,缺一不可,是一种递进的相辅相成关系,都可用来得出具有内在逻辑的结论和进行预测。3其中,第一类理论是提供基准点或参照系的、远离现实的基准经济理论,这类理论主要是以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环境作为理论背景的,提供的是在相对理想状态下的基础理论。不要小看甚至误解或否认这种基准理论的极端重要性,它至少有两个重要性:一是,尽管这些理论结果在现实中无法实现,但是它提供了改进的方向和目标,可以促进现实向理想状态不断逼近,也就是所谓的在现实中做任何事情,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因此,基准理论为判断是否更好、方向是否正确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必要标准,否则会导致南辕北辙。为此,我们能说基准理论不重要,以致否定它的至关重要性吗?二是,它也为发展出更为接近现实的另外一类理论奠定了必要基础,否则无从发展出来。就像物理学和工程学一样,首先需要发展出像牛顿三大定律那样的无摩擦、无阻力的理性状态下的基本定律、定理,然后据此修正,发展出更为现实的物理定律、定理之类的理论。现代经济学之所以能“一日千里”,发展迅速,没有这些理想状态下的经济理论作为基准点和参照系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要改革与转型,就一定要有目标,有目标就一定要有改革取向的基准点和参照系。的确如此,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探讨、理性思考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改革的走向及其所要实现的目标是首先要明确的,由此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基本制度才是根本的、关键的和决定性的。如果关系到国家的走向和长治久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基本制度没有确定,再好的经济理论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说不定还适得其反。因此,在改革的走向和目标都不明确的情况下,不要将经济理论的作用想象得无限大,也不要期望经济理论能解决关键性和根本性的问题。经济学没有“放之四海皆准”以及适合所有发展阶段的最好的经济理论,只有最适合某种制度环境前提的经济理论。

既然中国要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将新古典,特别是一般均衡理论等第一类经济理论所论证市场最优经济环境作为基准点,将竞争市场作为参照系,进行这样取向的改革就非常自然和必要了,从而就会不断地得到好之又好的改进结果。当然,由于许多基准理论提供的是在理想状态下的基础理论,尽管有指引改进或改革取向的“明道”作用,但和现实相差较远,不一定能照搬用来解决具体现实问题。也就是说,目标不等于过程,一个真正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从来不会简单地将第一类经济理论套用到中国情境中。当然,现实中不乏这样昏庸的经济学家,这就使得一些人不加辨别,甚至上纲上线地以所谓全盘西化等扣帽子的方式,来批驳那些对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目标坚定不移的市场改革派学者,认为是在照搬西方主流理论,不会分析过渡动态而只看长期稳态,只看发达国家而不看发展中国家,忽视了特定发展阶段的客观规律,是在搞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这其实是树错了靶子,甚至是空树靶子,射错了箭。有人反问和回答得好:“到底谁要求中国按照西方主流教科书改革发展了?到底谁说中国不要考虑初始条件和发展阶段了?中国改革发展理论现在的撕裂,根本不是要不要考虑国情与阶段的问题,而是改革目标是不是真正的法治的市场经济问题。被诬指为照搬派的大多数人仅仅是因为他们坚持经典教科书的目标体制而已。阶段派、特色派最大的误区是回避目标体制特别是达成目标体制的路线图与时间表,甚至用发展取消改革,从而破坏了知识界推动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合力,客观上赞助了既得利益集团将过渡状态永久化的阴暗努力。”

第二类理论则主要是旨在解决现实问题的经济理论,其前提假设更为接近现实,是对基准理论的修正,从具体功能来看,它又可以划分为两种:一是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分析框架、方法和工具,如微观经济学中的博弈论、机制设计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拍卖理论和匹配理论等;二是针对现实问题给出具体政策建议,如宏观经济学中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和理性预期理论等。

这样,由这两类理论组成的现代经济学是一个具有极大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处于动态发展中的学科,已远远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的阶段,而中国的经济实践更可为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丰富的现实土壤。在笔者看来,只要采用严谨的内在逻辑分析(不见得是数学模型),并且采用理性假设(包括有限理性假设),这样的研究就属于现代经济学的范畴。它不仅包括如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创立的新古典边际分析经济学和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这样的基准理论,也包括许多更为现实的经济学理论。比如,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和赫维茨所开创的机制设计理论都对新古典理论进行了革命性的发展。新古典理论将制度作为给定的,而诺斯和赫维茨却将制度内生化,视作为可变化、可塑造、可设计的,制定出符合客观环境的各种制度安排,从而它们都成为现代经济学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比如,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借鉴了第二类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方法和工具,但是同样也存在着需要避免泛用的警示。

由于第二类理论旨在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分析框架、方法和工具以及给出具体政策建议,应用起来必须特别小心。由于大多数这样的理论是基于一个成熟的现代市场制度而提出来的,因此简单的套用都是大有问题的。因此所制定的政策和制度安排的适用范围和边界条件在采用之前一定要先弄清楚,看是否大致合乎中国现实情况。但许多经济学家和部门没有认识到这个重要性,一味地照搬教科书中的理论直接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现在这样简单套用、泛用和误用经济学理论及其经济政策现象严重,比比皆是。 **(下转04版)**

▶▶▶ [上接9月29日01版]

致力于经济史学的中国经济学家群体

■《经济学家周报》副主编 白卫星

李宗正(1923—2000)主要从事西方经济学说史研究,他一些论著有较广影响。

苏星(1926—2008)的《新中国经济史》也是一部重要的有影响的学术精品。

宓汝成(1924—2015)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60余年,主攻中外经济关系,尤以中国铁路史研究蜚声中外。他参与编制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铁路部分》(严中平主编,1955年)和他独力编辑的《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三册)及《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1912—1949)》都是以精选的原始文件或具有较高价值的著作为主,其中外文资料由先生亲自译成中文,奠定了近代中国铁路史研究的资料基础,为广大经济史学者引用受益。他的专著《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9)》(1980年,2007年再版),全面剖析了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的政治、经济关系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指出了中国近代铁路运输“对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起着刺激作用,对中国加速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领土’和世界资本主义体制的经济附庸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一论断对中国近代铁路史研究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经君健(1932—)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工作已数十载,学术影响主要面是关于清代社会等级制度的研究,详细地分析了清代“雇工人”等级,探讨了明清两代这一特定等级的法律地位,指出“雇工人”不具备自由劳动者的特征,不能见到历史文献上的“雇”、“佣”的记载就简单地认作是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他把经济史、法制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其成果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他提出“中国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有着本质的联系”的观点,在学术界独树一帜。这个问题的提出,对深化中国封建经济和地主制经济的研究,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学术界评论认为,“明确指出封建地主制与商品经济有本质联系,而不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经君健教授无疑是第一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

另外,**杨端六**(1885—1966)、**吴斐丹**(1907—1981)、**刘天怡**(1914---1992)、**朱绍文**(1915—2011)、**叶世昌**(1929—)**汪海波**(1930—)等,在经济史学上都有一定贡献。

从“40后”“50后”的经济学家看,**董志凯**(1944—)在中国现代经济史、**谈敏**(1949—)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左大培**(1952—)在西方经济思想史、**汪丁丁**(1953—)在经济学思想史、**叶坦**(1956—)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他们都有学术创新。而就学术成果看,董志凯和叶坦这俩位女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我认为影响相对大一点,特别是叶坦开拓宋代经济思想史及中国经济学术史、经济范畴史以及东亚经济思想研究,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及传统汉学和中国经济史学的创新,影响较大。

从上述人物年龄看,最年轻的叶坦也过了一个甲子。经济史学界人才匮乏、后继乏人,需要谈敏、汪丁丁、叶坦等继续推进学术创新,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中流砥柱。 **(完)**